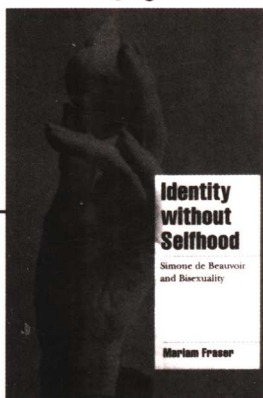


JIANQIAO XUESHU QIANYAN

剑 桥 学 术 前 沿



波伏瓦与双性气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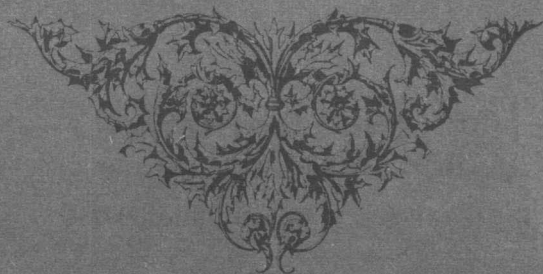
[英] 玛丽亚姆·弗雷泽 著
崔树义 译



中华书局

JIANQIAO XUESHU QIANYAN

剑 桥 学 术 前 沿



波伏瓦与双性气质

[英] 玛丽亚姆·弗雷泽 著
崔树义 译

中华书局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edition, entitled *Identity without selfhood*—Simone de Beauvoir and Bisexuality, hardback ISBN 0521 62357 by Mariam Fraser, published by the Syndicate of 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opyright©Mariam Fraser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Copyright©2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伏瓦与双性气质/(英)玛丽亚姆·弗雷泽著;崔树义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4

ISBN 7-101-04212-0

I.波… II.①弗…②崔… III.波伏瓦,S.de.
(1908~1986)—人物研究 IV.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3092 号

书 名 波伏瓦与双性气质

丛 书 名 剑桥学术前沿

著 者 (英)玛丽亚姆·弗雷泽

译 者 崔树义

责任编辑 徐卫东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frac{1}{8}$ 字数 198 千字

印数 1-5000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212-0/Z·503

定 价 26.00 元

致 谢

本书开始动笔于兰开斯特大学社会学系,完稿于拉夫伯勒大学社会科学系,感谢它们为我提供了令人兴奋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环境。特别要感谢林恩·皮尔斯(Lynne Pearce)、菲利普·古德柴尔德(Phillip Goodchild)和安德鲁·奎克(Andrew Quick)的帮助和热情鼓励,也要感谢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她加深了我对福柯和我自己论点的理解。安杰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纳塔利·芬顿(Natalie Fenton)、萨米克·马沙克吉(Sumiko Mushakoji)和凯蒂·麦克米伦(Katie MacMillan)都阅读了我的早期草稿并提供了支持和友谊,谨在此表示感谢。还要感谢凯蒂写下“字词的曙光”并亲切地允许我转引其中的诗句。衷心感谢克莱尔·亨明斯(Clare Hemmings)、安·卡洛斯基(Ann Kaloski)和默尔·斯托尔(Merl Storr)慷慨地让我分享他们有关双性气质的思考和参考文献,感谢凯瑟琳·马克斯(Catherine Max)自始至终的耐心。尤其要感激我的父母法莉黛(Farideh)和罗宾(Robin)以及斯蒂法尼·劳勒(Stephanie Lawler)、西莉亚·卢里(Celia Lury)和史蒂文·沃伯顿(Steven Warburton),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鼓励了我。

引 论

我们要求性说实话……我们要求它告诉我们我们的真相，确切地说，即我们自以为在自己的直接意识里所具有的那种有关我们自身真相被深葬了的真相。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卷一

福柯在《性史》卷一中提出，性别身份的获得同自我的获得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在现时代，人们觉察到性别处于自我的中心地位，因此，向性别的真相“让步”，就是向自我的真相让步。在这方面，身份与自我是联在一起的。

本书所关注的，正是身份与自我之间的这种几乎无法摆脱的关系。这里所讨论的性别身份，指的是双性气质(bisexuality)，即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所说的自我。大量的报纸、学术研究和传记作品¹都对这种被归属于波伏瓦的自我做了专门评论，认为它是她的属性和职责。但是，有意义的是，正如我将要指出的，虽然波伏瓦在三个文化创作领域的构成各不相同，但关于双性气质的论述却大多一致，即它在所有三种“类型”

2 波伏瓦与双性气质

(genres)中都是被不成熟地创作的。² 这表明,正是那些将波伏瓦创作作为一种可以理解并前后一致的自我的技术和实践,不是限制了双性气质的推论可能性,就是使之成为可能。我将会表明,正是那些被用来将波伏瓦作为一个个体进行创作的大量技术,同时又足以一再将双性气质作为一种属于自我的身份消除掉。

因此,通过文本传达的波伏瓦的人物形象就提供了一个媒介,通过它,人们可以探讨身份与自我的结合方式以及二者可能分手的时机。正是出于这一理由,本书的焦点不是论述自然性别本身,而是从自我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论述自我。因此,除了下一章的简要分析外,总的来说我将不会在任何真正细节问题上,去考察近来对那些自认为具有双性气质并且/或者对其感兴趣的作者们发起的性别争论的理论和政治介入。但是,人们对双性气质的愈加注意的确表明,就像我在此所提出的那样,双性气质并不总是一种缺失自我的身份。正如第一章将要表明的,显而易见,双性气质能够并且时常被宣称自我的一种属性。

然而,尽管近来这种关于双性气质的文献的急剧增多显然是一个展示(或重现)双性气质的场所,但对性别身份的构建同样也发生于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性别气质本身并非厉害攸关的直接和主要问题。我在此所分析的文本的注意焦点是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和由自我构成的身份。在这些文本中,双性气质不是被理解为存在于波伏瓦的躯体或者可能会显示她的自我“真相”的灵魂之中。相反,双性气质以多种方式超越了被归属于波伏瓦的个性。因此,本书的分析所依据的双轴线以及所探讨的张力在于:波伏瓦是如何作为一种自我被创作的?在关于波伏瓦的论述中,是什么样的当代自我概念——个性或许是也或许不是它的一个方面——排除了将波伏瓦视为“双性恋者”的可能性?

正是通过对自然性别和自我的各种创作方式的探讨,本书的分析才尽管只限于一个单独的个体,但却具有超出波伏瓦特性的意义。在本书中,我将始终探讨某些有充分证明文献、并在西方³被看作是构成了“可以理解的”自我的分界线的“自我技术”。这些技术可以相互协力,可以相互矛盾,或者只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例如,在时间或空间上)创作自我。⁴通过探讨这些使得波伏瓦的人物形象可以理解的技术,有可能说明:

使得人类可以思考的真相——附属于形象、词汇和解释等等的价值——同预先假定人类是某种创造物并根据这一见解而对他们起作用的技术、工具和设备之间的联系。(N·罗斯[N. Rose],1996年,p296。也可参见福柯,1998年a)

像我将在第二章说明的那样,甚至当代关于自我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同性恋理论,也不总是同被认为包括有界性和个性在内的自我概念保持距离。在这一方面,本书关于双性气质的研究将有助于说明:在近来的自我分析中什么是厉害攸关的,尤其是为什么性别气质经常处在这些争论的尖锐边缘。

本书将主要采用德勒兹(Deleuze)对福柯的分析(1988年)。德勒兹声称,福柯的著作改变了“思考的含义”(德勒兹,1988年,p120);福柯则宣称,“本世纪将被认为是德勒兹的”(福柯,1977年,p165),这进一步加强了这两位思想家之间概念上的联系。罗西·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指出:“哲学因福柯-德勒兹的联系而成为创造性、积极性和批判性的工作”(布雷多蒂,1991年,p67),如果不联系德勒兹,福柯的著作就绝对是不完整的,因为德勒兹“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追随福柯,并且以多种方式继续进行远远超出其创始者目标的福柯式事业”(布雷多蒂,1991年,p66)。本书肯定了布雷多蒂的主张:我将会表明,虽然福柯的著作提供了

4 波伏瓦与双性气质

一种有用的自我技术分析,但他自己的自我概念,即一种自我美学,却最终不足以说明本书所提出的“双性气质”。对于双性气质何以未能被构建为一种同自我联系在一起的身份的研究,也使得可以理解的自我对以多种技术创作的自我的成本变得明确化:

无数卑鄙的羞辱、自我诋毁、欺骗、谎言、诱惑、梅毒、贿赂、希望和失望问题,乃是这些“文明化”过程的价格,是它们的另一方面。(N·罗斯,1996年,p322)

我正是根据这一见解选择了框定本书的题词并将撰写本书末尾的结语。也是根据这一见解,我试图避免恢复欲望与自我之间的一对一关系,不是主张波伏瓦“真正”具有双性气质,而是考虑到缺失自我的身份这一概念所引发的种种可能性。我为此运用了德勒兹和瓜塔里(Guattari)对欲望的理解,因为重要的是,他们提供了一个不是将主观性假定为其最终裁判者的欲望概念。

注 释

- 1 这些分析限于英语文章,时间跨度为1980年至1994年。
- 2 这表明有可能确认推理出来的特点。这些特点贯通了这些个体类型,并将波伏瓦的特征纳入了其中,不过,仍然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波伏瓦是一位女性,因此这里对双性气质的分析明显地性别化了。正如我将要说明的,有一些自我技术自身或多或少地受到性别的影响。这正是福柯关于作者一功能所举例子的情形。我将论证(在第三章)作者的地位是随着作者的性别而形成的,并根据性别而发生变化。
- 3 就“西方”和“西方人”而言,我的意思明确是指玛里琳·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所说的“欧美人”。如她所言,这条术语超出了人们或许希望归结于北欧公民和北美公民身上的意义(斯特拉森,1997年,P40);它指的不是公民本身,而是欧美式话语体系。

- 4 参见 M. 弗雷泽 (M. Fraser, 1998 年) 对在身份被认为产生时其中常见对抗方式的含义的分析。

目 录

致谢.....	1
引论.....	1
1 身份与自我	1
2 身份与体现	35
3 揭人隐私	72
4 排除	119
5 移位	155
6 消除	190
7 失落你的面孔	218
结语.....	254
参考书目	264

第一章 身份与自我

在许多当代、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社会和文化理论中,在对“身份”或“主观性”做任何分析之前,通常总要先告诫说这是一些缺乏实质内容的主观立场,并程度不同地断言自我本身是通过社会和/或推论构建的。这些主张或许可以松散地被置于“解构”(deconstruction)的保护伞之下,它们对那些企图使自我具有政治性并在这一过程中揭露自然的、普遍的自我概念真相的人特别有利。¹例如,诸如罗西·布雷多蒂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就主张,正是由于“整个知识体系和科学论述”(布雷多蒂,1994年,p152)将特定的白种男人的观点与一般的人类观点混为一体,所以从波伏瓦 20 世纪 50 年代的著作到 90 年代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西方女权主义历史,才不断对身份和差异的概念提出疑问、修正和创作。²

虽然离开那种固定不变的身份概念的做法——尤其是由于这种做法呼吁人们注意“女人”内部和“女人”之间的差异——受到欢迎,但是,它却不曾产生它自己的那份张力。女权主义者已经表明,“拥有”一种身份会带来很多乐趣,并且有时拥有一种身份或以一种特殊的身份被认可并不是乐趣的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

(费伦[Phelan],1993年)。沃(Patricia Waugh,1992年)指出,对诸如身份、历史和行动者之类概念的解构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它们在能够被摧毁之前就必须存在。虽然布雷多蒂明确赞成身份的非稳定化(destabilisation),但她自己也指出:“当代哲学关于心照不宣的主体的死亡的讨论……对于妇女寻找其自己的理论发言权的尝试,具有直接的蒙蔽和破坏作用……为了解构主体,人必须有一个整体说话的权利”(布雷多蒂,引自本哈比[Seyla Benhabib],1995年a,p32)。沃和本哈比也指出,后现代理论本身就没有摆脱它们企图解构的“父权制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s)”(沃,1992年,p199):“(本应)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要注意到,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形而上学本身的批判有许多是在对元叙述着魔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至少从柏拉图起,西方形而上学就一直处在对“关于鬼怪的形而上学”着魔的状况之下……’”(本哈比,1995年a,p24)。但是,这些理论及其内部的问题可能并不一定同女权主义是否应当在这一领域结成联盟的问题有关。例如贾丁(Alice Jardine)就认为,完全排除现代性将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贾丁,1985年,p257),因为它提供了一些可能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有用的理论概念。格罗希(Elizabeth Grosz)也指出,女权主义者应当承认而不是否认“父权制的构架、方法和推测”,而且,更进一步说,正是“(女权主义)对父权制实践(包括那些围绕理论产生的实践)的沉浸,构成了其对这些实践有效批判和超越这些实践之运动的条件”(格罗希,1995,p57)。

因此,身份的“解构”对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迫使人们对“女权主义”概念本身以及通常被假定为女权主义基础的“妇女”范畴做进一步的反思。例如,虽然解构行动——尤其是对身份的“本质”概念的解构——已经被认为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揭示了知识生产的过程和知识本身不是中立的),但同样的情况是,身份和自我仍然是特权领域,从中可以明确地表达一种政治学(例如,像女权主义政治学中的“妇女”身份)³。为了回应这种自相矛盾的论点,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指出,虽然“采取一种反实在论的立场是绝对切中要害……但是从战略上讲,我们不能够这样做”(斯皮瓦克,1984/85年,p184)。而且,确确实实,当近来美国的一些反对同性恋的政治家和活动家表明自己渴望将同性恋身份放在自愿选择领域、而不是生物学本质领域中时,战略实在论的价值就已经得到了证明:

反同性恋的政治家和活动家们对近来汹涌而至的有关性取向的生物学报告的反应,是异口同声的“情况不是这样!”当前副总统奎尔(Dan Quayle)在1992年被问到有关大脑和遗传学研究的问题时,他说:“我的观点是,它更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生物学状况……它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勒瓦伊[Le Vay],1996年,p249)

如果同性恋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内在的本质,那么,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像奎尔所说的那样)。此处进一步的意思是说,作为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生物或遗传特质),同性恋或许是“未经选择的”。所以,生物学实在论——以及关于无法同自我任意“分开”的身份的主张——可以被用来保护同性恋和双性恋者免受反同性恋歧视浪潮的冲击。由于文化和选择本身就是被作为本质运用的,所以生物学和遗传学也就从压制变为保护同性恋者。⁴

一旦人们对其本质——不论本质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⁵——产生争议,身份就有被完全还原性排除的危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并且为了试图既维持一种反人道主义的立场,又维持某种关于

“身份”的初步概念,某些女权主义理论家把注意力转向了米歇尔·福柯的著作。福柯在一篇题为“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福柯,1991年a)的短小精悍的文章中,概述了他拒绝人道主义的理由,并将他自己的著作放在了人道主义的对立面。虽然他认为“并非……一切曾经和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事情都要被拒绝”(福柯,1991年a,p44),但是,他却对人道主义立足于“一些关于人的观念”(福柯,1991年a,p44)——诸如关于人类意识是“一切历史发展的最初主题”(福柯,引自德勒兹,1988年,p21)之类的观念——后来又粉饰并证明这些假设“毕竟是必须依靠的”(同上)做法,持批判的态度。不过,尽管福柯主张不能把主题理解为论述的最初源泉,但这一立场并未使得他完全省却对身份和自我的分析。相反,在他以其系谱阶段著名的时期(福柯,1991年b),他提到了主观性的产生问题,主张论述不仅仅是由陈述、而且是由主题本身构成的,它既是权力的目标,又是权力的客体。换言之,作为一种推论场所,话语主题被卷入了与允许理论文本发挥作用完全一样的权力关系之中。

在这种对论述的重新定义中,论述构成了沟通物质与理论的桥梁(布雷多蒂,1991年,p78-79,88-89)。正是这一重新定义,在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语境中成为福柯著作最富建设性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此,它值得我们做更详细的考虑。

福柯的新唯物主义

德勒兹认为,主题从文本存在向物质性存在的转变,开始于福柯将其注意焦点不只是像在《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1992 年 a) 中那样,只放在“陈述在知识中的首要地位”(德勒兹,1988 年,p33)上,而且也放在“可见之物的形式,而不是任何能够被表达的东西的形式”上(德勒兹,1988 年,p32)⁶。例如,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福柯,1979 年 b) 中,刑法典被理解为是明确表达犯罪的,而监狱本身则使得罪犯成为可见的,其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可见之物,即圆形监狱(Panopticon):“一种视觉集合和一种光线充足的环境”(德勒兹,1998 年,p32)。因此,可见之物,即论述的进一步层面,并不仅仅指字面意义上“看得见”的东西(诸如监狱或经验肉体的物质形式之类),而且也指我们所是和无法想象的东西:“例如,在 19 世纪初,大众和人口成为可见的,并出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同上)。在这一方面,未形成的东西被形成为物质,这“是由可见性所揭示的”(德勒兹,1988 年,p77)。

因此,根据德勒兹的观点,《规训与惩罚》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此后,其本身就相互密切关联的可见之物和可表达之物被知识和权力联在了一起。知识不在权力关系悬而未决的地方;确切地说,一切知识都表示或意味着一种权力关系。由于权力没有任何实质(没有独立的形式或内容),因此,它的影响领域是战略性的:权力乃是一种战略,或是一种非形式化的关系,其作用被归因于“部署、调遣、策略、技术和机能”(福柯,引自德勒兹,1988 年,p25)。权力的影响领域是战略性的,相比之下,知识的影响领域则是层序的(德勒兹,1988 年,p112)。知识起的是安排、管理和规范化的作用。它关心形式,形成物质(形成的东西,这是由可见性所揭示的),并使功能形式化(这是由陈述所揭示的)。

福柯发展了“图表”(diagram)概念,这个图表是“构成权力的各种力量之间关系的一种展示”(德勒兹,1988 年,p36)。两种管

理形式,即描述-现场和陈述-曲线(它们对应的是两种体系:视觉体系和语言体系,即可见之物和可表达之物),使得力量图表得以实现。因此:

图表不再是一种听觉或视觉档案,而是一张地图,一张与整个社会界共存的绘图……它是一架几乎又盲又哑的机器,尽管它使其他人能看又能说。(德勒兹,1988年,p34)

正是权力的失明和失语,以及不“显示”它本身的任何东西(任何隐藏的奥妙或意义),激励我们去看和说。⁷这是由于权力在本质上仅仅是“虚的、潜在的、不稳定的”(德勒兹,1988年,p37);只有当它被履行时,它才得到肯定、实现或“整合”(同上)。相反,“看和说则总是已经完全把握住了它们预先假定并要变为现实的权力关系”(德勒兹,1988年,p82)。所以,权力在成为压制性的之前是生产性的,它可以煽动、引诱、诱使和挑拨:

使权力仍然有效、仍然被接受的原因在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它不是作为一种惯于说不的力量使我们焦虑不安,而是全面研究和生产东西,引起快乐,形成知识,产生论述。它需要被作为一个贯穿整个社会体的生产性网络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具有压制性功能的消极的实例来考虑。(福柯,1991年c,p61)

福柯将权力重新定义为生产性的,认为它是一种充满整个社会界的微观物理学,同时他又强调知识形成物质并使功能形式化的方式,这使得他的著作具有了布雷多蒂所说的“新唯物主义”(布雷多蒂,1991年,p265)的外表:“唯物主义如此这般地[被重新定义],以将主体的肉体物质性包含在内”(布雷多蒂,1991年,p89)。Assujettissement一词将主观化(subjectification)描述成为一种既积极(主体)又消极(服从)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论述将权力

和知识连接起来。真理的定义也被扩展了。现在,真理不仅是一个产生和规范陈述的体系,而且还不可分割地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真理’以一种循环关系同产生和维持它的权力体系联在一起,同引起和扩展它的权力效果联在一起。一个真理的‘政治制度’”(福柯,1991年c,p74)。

对论述的这种重新定义,使得福柯能够考虑主观化过程的物质作用,同时,由于主体被理解为是通过权力关系矩阵产生的,因此这一定义替换了那种本质的、先验的自我概念,即那种“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始终以同样空洞方式存在的”人道主义自我(福柯,1991年c,p59)。从此,自我就被视为一种历史问题的存在场合,在这里,甚至连“我们已经变成了哪种人?”(N·罗斯,1996年,p294)这个问题,代表的也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事业。洛伊丝·麦克奈伊(Lois McNay)指出,在福柯作品的最后阶段,“既定的个性化模式通过对我们认为普遍必然的身份形式的质问而被抛弃,目的是为了说明偶然事件和特定历史事件在其中占有的地位”(麦克奈伊,1994年,p145)。

正如埃尔斯佩斯·普罗宾(Elsbeth Probyn)所主张的,正是这种在不依靠人道主义的情况下对自我、特别是对个性化过程的集中关注,使得福柯能够形成“一种不是围绕个体、而是依靠力量组织起来的理论样式,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空间,使我们能够认真考虑我们是如何被赋予个性的”(普罗宾,1993年,p136)。这样,举例来说,福柯就揭示出:作者是在“观念、知识、文献、哲学和科学的历史上一个享有特权的个性化瞬间”出现在论述中的(福柯,1991年d,p101)。这并不意味着由个体做出的意志行动产生了那个作为作者的个体,而是意味着主体状态“作者”有助于个性的产生(请特别参见第三章)。如罗莎琳·迪普罗斯(Rosalyn